

● 中华全史百卷书

巨著系列

65

中国古代 游记名著

夏继果 黄同华

●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中华



《中华全景百卷书》

编委会

顾问:徐惟诚 袁宝华 于友先 任继愈

苏 星

总编委会主任:李志坚

总编委会副主任:何卓新 孙向东

总编委:范西峰 董蕴琦 李学谦 李 伟

朱述新 母庚才 李建华

编委:(按姓氏笔划排序)

丁晓山	于振华	马艳平	王 红	王 伟
王 勉	王士平	王尔琪	王奇治	王品璋
王恩铭	王寅诚	王骊岭	石建英	卢云亭
田人隆	申先甲	刘 达	刘 彪	刘文彪
刘克明	刘树勇	刘振礼	刘俊华	刘峻骧
刘森财	成绥台	孙玉琴	孙彦钊	邢东风
李元华	李明伟	吕品田	吕金陵	朱立南
朱祖希	朱筱新	朱莱茵	朱深深	伍国栋
华林甫	向世陵	杨菊花	吴舜龄	宋志明
宋剑霞	忻汝平	汪家兴	张 正	张亚立
张兆裕	张则正	张鹏志	陈晓莉	陈绥祥

陆道中	武 力	武玉宇	赵艳霞	罗静文
周 亮	周育德	金启凤	金奇康	金德年
金德厚	宗 时	空 宇	郑玉辉	郑进保
泽 昌	胡 洁	胡振宇	郝 旭	春 晖
钟 玉	郭文杰	郭积燕	郭素娟	袁济喜
夏继果	徐兆仁	徐庆全	钱 冶	浦善新
唐 忠	梁占军	涂新峰	黄同华	曹革成
蒋 超	葛晨虹	鲁 葳	焦国成	曾令真
谢 军	邵爱红	裴仁君	熊晓正	戴瑞丰
※		※		※

总策划·总编辑：朱新民

执行总编辑：傅亿仲

副总编辑：贺耀敏 恽鹏举 刘占昌

装帧设计：王 晖 尚云波

编辑人员：任自斌 董凤举 曹革成

孙建庆 徐庆全

主旋律的音符

(总序)

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民族。在我国历史上,爱国主义历来是激励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伟大旗帜,是推动祖国社会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,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,对于振奋民族精神,凝聚全民族力量,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,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,中共中央关于《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》明确指出,在使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、社会主义思想“成为全社会的主旋律”。爱国主义教育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,要求人们从确立社会“主旋律”的高度认识其重要性,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,作为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理想、信念、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共同基础。

上篇 导读语

我国古代的地理文献十分丰富。在历代正史中,有十六部地理志、六部河渠志,地志多达数千种,各种专书、专志、行记、笔记不计其数。

正如一切知识的积累一样,中国古代的地理著作也有一个从简到繁、由单一到多样的漫长过程。

一、先秦时代地理学著作的创立

在遥远的古代,人类的祖先由于生活上的需要和实践,逐渐认识了自己所寄居的环境,自然而然地积累起了一些地理知识。从迁徙无定的采集和游牧生活,改变成为定居的农耕生活,可能是一个个居民点定名的关键因素之一。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,随着社会活动的扩大,地理知识增加了。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之间商品的流通、文化的交流和战争的冲突,也都会促进地理知识的交流和发展。

从我国最古老的甲骨文开始,就出现了不少

地理性的零星资料。但由于多数地名早已失传,很难判断它们的部位。

在后代保存的古代文献中,孔子所整理或编写的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和《春秋》,即所谓的《五经》年代最早。《五经》中保存了大量地理资料。比如,《诗经》收集诗歌三百零五篇,几乎有半数的篇章提到许多大小河流。一些著名山岳的名称,以及镐京、岐下、牧野等若干地名,一般都是周代所通用的,有许多还沿用到后代。而《春秋》则记载了历年的灾异,包括日食、水旱、大风雪、地震、螟、螽(蝗)等情况。

《尚书》中的《禹贡》,被公认为我国古代文献中具有系统性地理观念的作品,还被称为“我国古代地理著作的始祖”。《禹贡》的体例是以山川为主体,它的九州划分曾在长时期内作为一种超时代的地理区划。

战国后期,地理作品更是层出不穷。比如,《管子》中的《地数》、《地员》和《度地》篇,《五藏山经》、《穆天子传》等等。当然,这些著作还比较原始,其中还有许多神话、传说的成份。但是,我国的地理学著作毕竟在先秦时期出现了。

秦汉时期,我国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,西汉时期还进一步向边疆各地扩展。这时期,

生产和文化多方面得到发展。东汉早期，宦官蔡伦发明造纸术，并于公元 105 年进献和帝，获得赞许，造纸业得以扩大生产。抄本流传打破了旧时简重昂贵的限制，有关地理的各种作品，从此加快形成，而且在多方面发展，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地理著作。关于西汉初年到明清时期我国地理著作的发展，我们将按地理志、地方志、游记和专题研究几个方面，分门进行纵的探讨，以有利于了解每一个门类的发展过程。

二、地理志和地方志的发展

全国性的地理志发展很早，而且长期持续不断，这是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。但是地理资料首先在历史作品中积累，这是东西方地理学史上的一个通例。前面提到的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等，就表明了这一点。西汉时编著的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，更是兼顾到了地理资料的系统化。以后历代编著的断代史，大致保持这种遗风，既有系统的地理专篇，又穿插着零散的地理资料。

我们可以把正史中这些地理性的篇章大致分为五类。第一，《史记》创立《河渠书》，以后的史书改称为《河渠志》，主要记述兴修水利和治理水害。第二，由《汉书》创立的《地理志》这种体例，以一朝某一时期的疆域政区为主体、为纲领，把有关的地

理情况附于该政区之后。第三,同样从《汉书》开端的《五行志》,虽然是以唯心主义的吉凶征兆和阴阳五行(金木水火土)相生相克的观念为基础,但经常记载水旱霜雹、日月食、地震山崩、陨石虫害等重要资料。可惜的是只记年月而地区不明。第四,《史记》的《平准书》和《货殖列传》,《汉书》改为《食货志》,主要是涉及经济的,因而带有不少经济地理的资料。第五,列传中尤其关于新开拓的边疆或是综合性的《四夷传》,或个别少数民族专传,偶尔还涉及国外的情况。

正史中的地理专篇之外,还有一些地理志专著。但最早的几种地理志专著,久已失传,只是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还保留一些线索。《隋书》于唐初编成,据其《经籍志》记载,最初的地理志专著收集资料的范围极广,包括历史、文学、游记等,不限于地理情况。

唐朝时期,在居于高位的阶层中,也接连有人对于编著地理志发生兴趣。比如,历任京内外要职的贾耽曾编成《古今郡国四夷述》四十卷。可惜该书没有流传下来。

我国现存最早的地理总志是《元和郡县图志》,由晚唐元和年间的宰相李吉甫所编著。李吉甫在魏晋南北朝舆记图经的基础上,总结前人的

优点,使自己的体例更为完善充实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的体例就是以州县为线索,比较全面地叙述各州县的地理现象,举凡自然状况、城市形势、人口分布、交通道路、水利措施、主要物产以及贡赋、陵墓等,无所不包。
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是承前启后的地学名著,它的体例为以后的作者所禀承。宋初乐史编著的《太平寰宇记》,就基本上承袭了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的传统。

除了以上提到的全国范围的地理志,我国古代还有大量的局部地方的地理志,即所谓的地方志。

地方志起源于东汉时期。章帝朝(76—88年)议郎杨孚曾著《交州异物志》,三国时吴人万震著《南州异物志》,出仕于吴国的沈莹著有《临海水土异物志》等等。但这些著作在隋唐时期就已亡佚。

在流传到现代的地方志中,最为古老的是西晋后期的常璩所编的《华阳国志》。但是从内容衡量,只能把它作为地方志的先驱。“华阳国”无论名称或是它的范围,历史上从来没有自成一国。作者创立这个名称,只是把两汉时代的益州,假定为相当于《禹贡》的“华阳黑水为梁州”。全书十二章,大部分偏重于郡县建置与历史人物。不过前四章划

成《巴志》、《汉中志》、《蜀志》、《南中志》，带有地方志的性质，分别说明境内的郡县，以及历代的沿革。

地方志定型成为郡县志，大致是在宋代。北宋经过辽金的入侵，战祸频仍，北方遗留下的这一类作品极少。南宋各地郡县志发展较快。由于受到木板刻印术快速传播的影响，每一种书编成后得以刻印，更是有利于流传到后代。

地方志的名称大概配合历代地方制度的演变。秦并天下，创置三十六郡，郡下设县。唐分天下为十道，道下设州，州下设县。宋改道为路，元改称行中书省，简称行省。明改布政司。宋代中级地方，兼用府或州，州府下设县。元明对中级与初级地方的名称，大致与宋相同。因此，宋以来的地方志，通称府志或县志。

郡县修志一举，在明代颇为发达。出现大量有相当份量的作品。

由于编者自己对于当地的环境比较熟悉，因此，地方志往往能够提供一些精确的地理资料。

三、举世闻名的游记

我国古代写山水，记游踪的佳制名篇，丰富多彩，源远流长。春秋战国时期，《论语·先进》云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

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这几句虽然是孔子弟子曾点言志的话，但已略见记游的端倪。

战国时期，我国出现了神话故事性的游记——《穆天子传》。这部作品在西晋时出土。在这部作品中，作者依靠神话性的车马，率领神话性的随从，访问高山大河的神灵，构思出一系列神话性的旅游。创立旅游记的格局和叙述方法，可以说是这部作品在地理学史上的特殊作用。

汉代，张骞与班超两次通西域，丝绸之路的开发，使得我国与西域各地的联系日益增多。各族商人往来于丝绸之路。大概由于商人重利，没有留下什么作品。但是，在这条道上，还出现了许多文化人，这就是佛教的高僧们。

自从汉明帝在公元 65 年派遣使者去西域求佛法，精通佛法经典的西域高僧，不断有人东来，而国内的高僧也逐渐有人去西域各地取经。为了求取佛经，他们不畏千山万水，冲破艰难险阻到达印度，成为古印度佛学名师门下的留学生或留学僧。其中一些人把自己的经历记述下来。这样就出现了东晋高僧法显的《佛国记》和唐初高僧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两部闻名于世的游记。

《佛国记》由法显亲自撰述，讲得非常真切。它无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篇空前艰险的万里远游

的旅行记。《大唐西域记》由玄奘口述，弟子辩机执笔。由于是遵照唐太宗的旨意所撰述，所以公开流传更早更广。但它采用了地方志的体例，不能准确记载玄奘具体行程。

与陆路的游记相对应，我国古代还有许多海上游记。

我国的航海业，最晚起源于秦汉。继隋、唐时代的特殊发达之后，宋、元两代以来，已经在东南沿海的几个港口设置市舶司，管理海外贸易。明永乐三年，开始了郑和下西洋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壮举。在郑和的随从人员中，马欢担任阿拉伯语的通译，直接参加商业活动。费信与巩珍出身行伍，只是一般的随从人员。他们三人都有游记传世。马欢写《瀛涯胜览》，记述出访各国地理及风土人情。费信著有《星槎胜览》一书，记述了四十个国家的地形、气候、物产、民族、风俗。巩珍著有《西洋番国志》，记述南洋二十余国的地理情况。这些著作，皆作者亲见亲闻，因之内容翔实可靠。缺点是三书都过于简略。

在我国古代游记的发展过程中，明末的《徐霞客游记》可谓集大成者，是短篇游记的精华。传统的游记都是描述个别风景区的短文，而徐霞客从头到尾采用日记的格式，每一个风景区都包括好

几天的日记,也就有好几篇短文。他晚年的西南游,联系成许多条路线的游记,在特殊的地点都有可以自成短文的详细记述。他构思精湛,文笔流畅,所以每逢见到奇景异物,自然意气风发。

《徐霞客游记》在我国古代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直到今天,它还可以提供许多宝贵的科学资料。例如,各个山区的岭脊对于溪流的分水作用,西南行各篇中关于溶洞的部位、结构、景象及其与水流的关系,温泉的布局 and 部位,少数民族在滇西的分布和生产发展等等。

可以看出,我国历代的游记,在其发展过程中,内容发生着重大的变化,这远超过全国总地志的演变。在有关范围内;它们也可以填补地理志的一些空白,尤其是关于广大边疆地区和域外。

四、地理专著的典型。

从以上的介绍,不难发现,作为地理学著作,地理志和游记往往具有很大局限性。地理志有些依附于史学,游记则往往是为了某种使命而作,并非出于科学考察地理形势的动机。当然,《徐霞客游记》是例外。

然而,我国古代独立、科学的地理学专著也是屡见不鲜的。

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的人口大迁徙时期。

由于人口的移动。人们的地理知识增加,地理著作空前增多。其中最为杰出的就是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。这是一部水文地理的专著。春秋战国时代的《禹贡》和《五藏山经》只有简略的水系源流观念,而《水经注》则是有完整体系的水文地理,对于特大水道从发源到入海的线路,以及较大的支流,都从头到尾加以说明。

南宋时期,先后有三家用不同的方式研究《尚书》中的《禹贡》。其中,程大昌写成了《禹贡论》,毛晃写成了《禹贡指南》,傅寅写成了《禹贡新断》。虽然三家阐明《禹贡》旨意的方式各不相同,但是他们的先后协作使得《禹贡》成为《尚书》各篇中受到特殊重视的一篇。《禹贡》的九州区划和导山、导水各节的基本地理概念,更受到重视。

水利是农业的命脉,它与人民的生活及生命财产的安全息息相关。宋、明两代,先后有三家专门研究水利问题。北宋时期,单锷积累长期考察太湖东、西、北三面许多河渠的经验,编成《吴中水利书》。书中论述吴中各地兴修水利,治理水患。作者对于有关河渠的淤塞、改道、修堤、疏导等情况,都了如指掌,从而提出各部分应当采取的措施。出现于南宋时期的《吴郡志》的《水利》一卷,采录了当时的好几篇有关水利问题的短篇资料,这说明当

时吴郡一带的人对水利的关心。这一卷是地方志中别具一格的资料,采录的资料的原作者,或多或少都做过实地调查。

治理河水溃决的水利工程,尤其是黄河下游,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。但是,在明代以前,即使在河防工程中有过经验的官员,也从没有人能系统记述自己的体会。明代,主持治河的专家潘季驯总结经验,写成《河防一览》。这是一部水利工程专著,但包含着作者从工作实践中得来的地理见解。作者善于考查各地段的地理条件,以制定适当的治理方案。此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16世纪后期应用地理学的情况。

元代以前,我国浮海远航南海和印度洋各国的人数不少,撰写海外行记者亦不乏其人。然而,行纪均出自使节或僧侣的手迹。元代地理学家汪大渊则不同。他浮海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“海外之风土”,进行海外实地调查。因而,他所写的《岛夷志略》是我国地理学者亲历海外考察编纂而成的第一部海国地志。它记述了东方热带许多岛屿或大陆边沿各地的复杂情况,对于有关各地,大致也都是年代较早的可靠记录。它在我国地理著作中别具一格,也可以占到世界名著的地位。

明代王士性的《五岳游草》,提出了我国此前

所罕见的系统性自然地理观念。基中的《地脉》、《形胜》、《风土》三节，都带有全国地理总论的意味。地脉方面，特意插入唐代僧一行与杨益的见解，以说明历史背景。对于明代国境内的山脉体系，叙述更加详细。《形胜》一节，陈述当时所采用的行政区划的自然形势，兼有政治地理的意味。《风土》则兼顾到天气与地气，后者涉及土性、地温、以及地下水位，偏重于南方少数地区。

徐霞客是一位极富科学精神的旅行家。他虽然以《游记》而著称，但他的《盘江考》和《江源考》却以其科学、严谨的风格成为现代地理学学术论文的先驱。尤其是《江源考》，大胆否定了《禹贡》“岷山导江”的错误说法，提出了“故推江源者，必当以金沙为首”的结论。这两篇论文足以与他的游记媲美。

下篇 名著介绍

《禹贡》

《禹贡》是“我国古代地理著作的始祖”，是研究先秦时期地理环境的重要著作。

一、《禹贡》的成书时间和作者

《禹贡》究竟成书于何时？我国学术界的看法尚不一致。较为普遍的看法是：《禹贡》是公元前300年左右，即战国时代的作品。这一观点的论据有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，在我国，直到春秋时代才出现铁器，钢的出现则更晚。而《禹贡》梁州的贡品中有璆、铁、银、镂。《说文》云，镂就是钢。可证《禹贡》是战国时代的作品。第二，《禹贡》九州的名称源出春秋、战国的国名。第三，《禹贡》九州的地理范围，包括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，与战国时代地域相当。《禹贡》中的梁州，是公元前316年才纳入中国版图的。第四，九州说和五服说是战国时代儒家思想的产物。

古代文籍往往不是成于一时一人之手，而常常是经过一个较长的流传时期，由前后不同的人